

# 西康文化历史

## 珍稀资料汇编

Xikang Wenhua  
Lishi Zhenxi  
Ziliao Huibian

主 编 罗晓东  
副主编 张学勤



四川大学出版社

编委会◎相洛夏永智代向红郭昌平

张学勤苏谦万馨王珍  
任尧王国硕李立



插图一 文史资料《观察》杂志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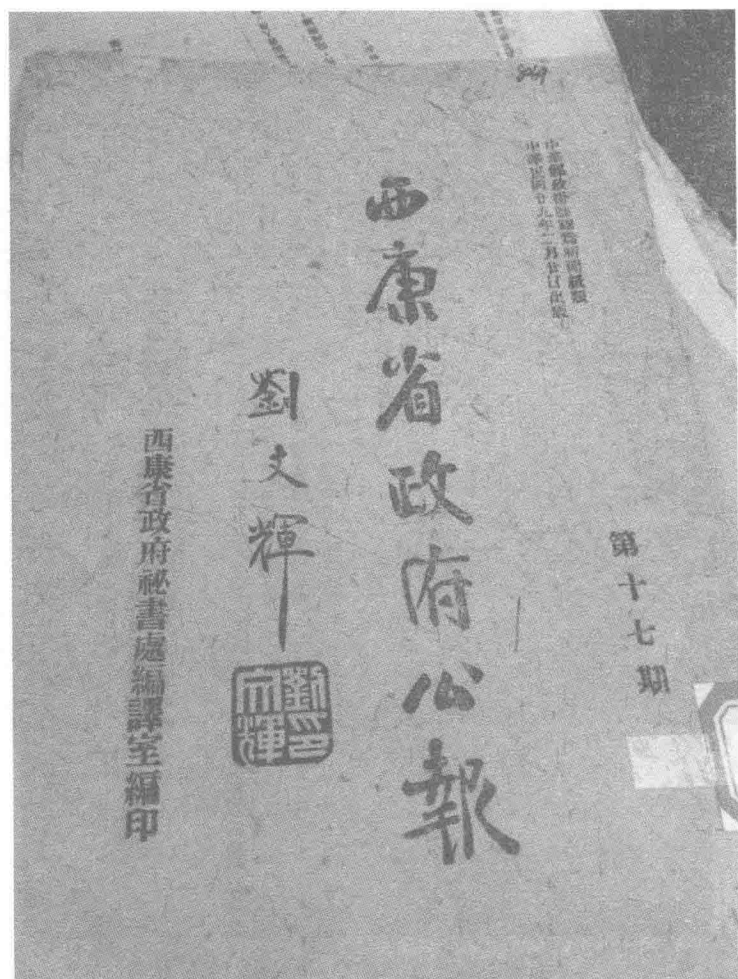
插图二 文史资料《西康省临时参议会》



插图三 文史资料《康藏史地大綱》(任乃強著)



插图四 文史资料《西康财政》



插图五 文史资料《西康省政府公报》

# 西康藏羌彝文化历史研究 的战略意义（代序）

罗晓东

四川省干部函授学院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 一、西康藏羌彝文化历史研究综述

### （一）民国时期的研究

在民国时期，对西康地区进行研究的众多学者中，吴丰培、刘曼卿、方国瑜、徐益棠和任乃强、孙明经是杰出的代表，而徐益棠和任乃强的主要研究成果深远地影响了相关的民族政策和政治发展。

其中学者孙明经，与 40 多位学界代表一道抵达雅安。他们从 1939 年的 6 月初启程至 12 月底，携带照相机与摄影机，翻雪山，涉激流，行程万余里，完成了一次用电影活动影像和照片记录考察成果的西康发展之旅。在将近 6 个月的考察中，孙明经共拍摄了 8 部电影资料短片和 2000 多幅照片，并已成为后来者了解当年西康风土人情的原始资料。

1944 年，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再次邀请孙明经访西康，除给西康当地的人们放映他第一次来康考察拍摄的电影外，又再次拍摄了西康建省后的新面貌，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

中国最早发起边疆研究的著名学者和中国民族学会的创始人徐益棠，在其主办的《边疆研究论丛》中，借助人类学研究，侧重于民族志及其对边疆和康藏婚制的论述，表现在强调文化传播

与历史，注重比较的视野及藏族语言文字等方面。藏学家任乃强以《西康图经》等成果“开康藏研究之先河”，针对时人对康藏民族和风俗文化的隔膜和误解，客观真实地介绍了西康藏族的社会、文化和习俗，以及康藏地区藏、彝、汉等民族长期和睦共处的情形，尤其是对西康省的地理、政治、经济、文化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对西康省区域治理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西康省历史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以费孝通为代表的学者对西康地区的社会历史与民族发展，尤其是对西康地区的寺庙宗教、土司历史进行了调查和研究，整理出版了众多的研究报告如《西康纪事诗》（贺觉非、林超，西藏人民出版社）、《赵尔丰川边奏牍》（吴丰培，四川人民出版社），研究工作集中于西康政治发展与沿革、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

## （三）新时期西康地区文化历史研究

进入21世纪，李绍明等学者在康藏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康巴学”。西南民族大学召开了首届“康藏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西南民族大学赵心愚、秦和平和四川师范大学王川编辑出版了《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等研究成果。另外，巴蜀书社出版了《清末川边藏区改土归流考》。

四川师范大学王川则在梳理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西康地区近代社会研究》，剖析了影响西康社会关系的各种要素，揭示了西康以及整个藏区与祖国不可分离的关系，论证了西藏地区、西康地区与祖国在民族、文化等个层面的紧密关系，是一种基于强化西南区域史研究方法的尝试。

北方民族大学王海兵在《康藏地区的纷争与角逐（1912—1939）》一书中，着重探讨了民国中央政府、川滇康青等地方军事势力、康巴精英以及西藏地方政府在康藏地区纷争中的权力互动与力量角逐给康、藏关系以及中央政府在康藏地区的政权建设

带来的影响。

北京大学马戎教授 2013 年 7 月在共识网发表的《对当代中国民族政策的反思》一文中，提出民族问题的处理与民族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可以借鉴刘文辉在西康省时期的民族政策，即对于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民族政府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有一个大的政策设计，一个政体框架，具体到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治理方针，各个地方也不相同”的观点。

#### （四）研究的侧重点与中心问题

当前学术界对于近代西康文化历史的研究，多集中在土司历史、改土归流、民国军阀史、经济建设等政治史和经济史领域，正如王川指出的，学界对西康省基层组织、宗教与文化等社会领域研究相对薄弱。

西康地区为我国三大藏族聚居区之一，包括四川藏区如甘孜州、阿坝州、西藏的昌都、云南西部地区和青海的玉树州以及果洛的部分地区。除藏族外，区内还有羌族、彝族、纳西族、蒙古族、回族、汉族等 10 余个民族民众。

在近代西康省的独特的战略地位中，民族问题一直是核心问题，因此，将民族政策作为专项来研究，既具有综合整理专项突出的学术价值意义，又具有民族政策研究领域内的开拓创新意义。

## 二、西康省建省与撤省的历史概要

### （一）赵尔丰与西康建省的动议

光绪三十年（1904），建昌道赵尔丰向四川总督锡良上“平康三策”：

第一策是整顿治理西康与川滇腹地边境野番地区。“将腹地三边之俅夷，收入版图，设官治理，……三边既定，则越嵩、宁远亦可次第设治，一道同风。”

第二策是将西康改土归流，建为行省。“力主改康地为行省，改土归流，设置郡县，以丹达为界，扩充疆宇，以保西陲。”

第三策是开发西康，联川、康、藏为一体，建西三省。“改造康地，广兴教化，开发实业，内固蜀省，外拊西藏，迨势达拉萨，藏卫尽入掌握，然后移川督于巴塘，而于四川、拉萨，各设巡抚，仿东三省之例，设置西三省总督，藉以杜英人之覬觐，兼制达赖之外附。”

清政府川边的设立，相当于“特区”民族政治。

赵尔丰在藏区厉行改土归流政策，很快就建立起昌都、江达、查隅等 20 多个州县，所得土地东西 3000 余里，南北 4000 余里。在川滇边的治理上，赵尔丰先以兵威平定地方，随后开始从四川移民垦荒，发展生产，兴办新式学堂，同时派康藏弟子到内地学习先进知识技术，修筑川藏路，有力地巩固了川边藏地区的稳定。赵尔丰为西康的发展和后来建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西康建省前期，傅嵩炘也起着关键的作用。他是赵尔丰的继任者，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入赵尔丰幕府，宣统三年（1911）以道员代理川滇边防务大臣积极推行川边改土归流事宜。

傅嵩炘详细考察了川边地区的地理环境及历史沿革和宗教习性，也意识到英国人的险恶用心，力促西康建省，并筹划写出了《西康建省记》，第一次提出了西康建省的详细计划，“查边境乃古康地，其地在西，拟命曰西康省”。

《四川省志·大事纪述》中记载，1911 年，赵尔丰上任四川总督后，傅嵩炘接替赵尔丰代理川滇边防务大臣，8 月 10 日即上奏川边设立西康省。他说，康地介于川藏之间，“乃川省前卫，西藏后劲，南接云南，北连青海，地处高原，对于四方皆有建瓴之势，非特与川滇辅车相依而已”。

自从赵尔丰经略川边以来，大部分地方都实行了改土归流，设置了厅、府、州、县，建省规模已初步形成。傅嵩炘建议取名“西康”省，并大致划出了西康省的行政区域，东起打箭炉（康

定)，西到丹达山顶，南抵云南维西中甸，北到甘肃。清政府准奏，并转赵尔丰，这正合赵尔丰之意。不久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灭亡，赵尔丰被杀，回成都的傅嵩林被抓，西康建省计划也就搁置下来。“这一时期系从光绪三十二年起至宣统三年止（1906—1911年）。”

## （二）刘文辉与西康省的设立及建设

1937年上海淞沪会战失败后，国民政府鉴于首都南京无法坚守，为坚持长期抗战，作出了将国民政府迁至重庆办公的重大决定。重庆成为陪都，使四川变成中国抗战的最大后方战略基地。

同时，整个国家重心西移，国民政府开始考虑长期抗战需要大后方。民国二十三年（1934），国民政府加紧边防之建设，决定组织西康建设委员会，任命刘文辉为委员长。民国二十四年（1935）二月，行政院颁发建省委员会组织条例，同年七月在雅安正式成立，九月建省委员会转移到康定，并在十月开始办公。

民国二十七年（1938）四月，蒋介石电召刘文辉到武汉商议西康省建省之必要。在当时抗日战争形势下，蒋介石也同样意识到大后方建设的紧迫性。于当年11月，行政院决议，准予西康建省。

民国二十八年（1939）元旦，西康省政府正式成立，在历史上酝酿了30余年的建省工作，终于实现。

刘文辉对于西康省的治理，提出了“三进三化”。“三进”即对康属稳进、对雅属逐进、对宁属猛进。“三化”即对少数民族以德化代替征服、以同化代替分化、以进化代替羁縻。刘文辉的这些方略，当时对安定西康、发展经济起到一定作用。

## （三）西康省撤销行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0年4月26日成立西康省人民政府，省府驻康定，省主席廖志高，全省分设康定、雅安、西昌3个专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撤销热河省、西康省并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建议（1955年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撤销西康省，将西康省所属行政区域划归四川省。

### 三、西康藏羌彝文化历史研究的地缘政治意义

#### （一）清末西南局势与边政管理

清末时期，列强环伺，英国盯着西藏，沙俄觊觎新疆，清政府在对西南边区的管理上加强了对康区的各项投入，并派出大臣专项治理，实为巩固康藏边疆。

因此，最初的西康省的设立构想，远非一个简单的行政区划，而是为了抗击英国人的侵略和西藏的分裂行径。当时地处川藏边缘的康定、丹达山一带的广大地区称为川边地区，南接云南，北连青海。这片地区一直就是清政府管理的薄弱环节，虽多年征战，但各土司相对独立，各自为政。

1904年8月，英国借口保护英商人安全自由通商，从锡金进兵西藏，击败藏军，强迫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城下之盟《拉萨条约》。

赵尔丰是清代后期的一个铁腕人物，1903年任建昌（西昌）道员。他洞察英国野心，上书四川总督锡良，在川边地区废除土司等特权，改土归流，设立县制，划为行省，以抵御英帝国主义的分裂企图。锡良上奏清政府，请批准建省计划。

1905年，川边土司叛乱，赵尔丰率军平叛有功，清政府也明显感觉到川边的重要性，随即任命赵尔丰为驻藏大臣兼川滇边防务大臣，全权处理川边事务。赵尔丰建议，将四川总督移驻到巴塘地区，并在四川省和拉萨各设巡抚一职，仿效东三省的管理办法，设立西三省总督。

赵尔丰在康区，改土归流，发展教育，采取多项措施，巩固

政权。贺觉非在《西康纪事诗本事注》中“赵尔丰经历情况及其永世”评说：“尔丰之治边世，先以兵威……边地既定，即从事各种建筑。”又说：“赵本人亦明敏廉洁，办事公道，康人多信服之。”可见赵尔丰恩威并举，对西康后来的发展功不可没。

## （二）民国抗战后方国防的发展

刘文辉在西康建省的思路，一方面延续了赵尔丰等人的思想，另一方面也发展创新了他们的思想。他曾在《建设新西康十讲》中谈道，清代的代理川滇边防务大臣傅华丰（即傅嵩炆）曾经在奏折中说“边地（西康）界于川藏之间，乃川省前卫，为西藏后劲，南接云南，北连青海，地处高原，对于四川确建瓴之势，非特与川滇辅车相依而已”。

由此看出，清代朝廷意识到西康在国防中的重要战略地位，要“守康境，卫四川，援西藏，一举而三善备”。

刘文辉在此基础上从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出发，提出了自己的国防思想与西康战略定位。他指出西康省的国防应该有四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联络青海、新疆，贯通西北、西南各省，从而为整个国家的国防布置做出贡献。第二个方向，强化川康，屏障西南，让四川做西康省的粮仓，西康则是四川的屏障，两省疆域相连、唇齿相依；川康应为一体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相互影响，利害共生。如此，则西南国防稳固，中央无西南之忧。第三个方向，经营西藏，安靖边地。由于西藏虽然资源丰富，但是被英国和俄国紧盯着，因此要发展西藏，就必须首先发展西康。西康发展，交通便利，军备充足，就可以经营西藏。第四个方向，缅甸、印度接壤的国防关系与外交关系。当时，刘文辉已经指出，在战争形势的不利情况下，若是入海口丧失，我国可以从印度、缅甸接收军备物资等支援，因此，打通国际交通线具有同样重要的战略意义。

## （三）“一带一路”视野下的川藏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是新时期国家实施对外开放合作的一项重

大战略决策，为沿线各国以及国内相关省区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一带一路”倡议是双向的，应该既是“走出去”战略的升级版，也是“引进来”战略的升级版。

而四川、西藏、云南、青海正处于这条重要的战略布局线路上，一方面是中国西部大开发、大发展的重要区域，另一方面是国家推行一带一路战略布局的关键辐射带。

要发展，既要大力引进国际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积极开展国际区域合作，精心组织好重大国际性展会、投资促进和开放活动，又要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加快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发展既是四川、西藏、云南、青海相互对接、服务国家战略的职责所在，也是这几个省区自身发展、转型升级的强力支撑和重大机遇。

在现实的政治意义上，原西康区域的复杂恰恰为现有的民族政策提供了一种样本案例。“治藏必先安康”“化藏必先化康，经康即所以经藏”，西康省先后实施的有利于加强内地与西康地区、汉族与藏族彝族等少数民族的联系政策，促进了西康的发展，保障了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推动了民族地区文化经济社会发展的效果。

#### 四、西康省民族政策的样本效应

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和民族关系作为国家发展中重要的战略课题的前提下，深入研究近代西康省及其建省前后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关系，对于四川省，甚至西南地区，乃至国家宏观层面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文化意义与现实的政治社会意义。

##### （一）西康局势与文化的独特

近代西康省的民族政策有其独特与复杂之处。独特于历史上的英国对我边疆西藏地区的觊觎与颠覆，独特于康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纷争与曲折，独特于清末的改土归流与民国的行政建

省，独特于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和地方军阀的角力，独特于其西南边陲与中华腹地连接的地理位置，独特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政策协调与博弈，独特于汉藏民族关系、川藏行政关系的调整与融合。

以文化传播与文化融合为宏观研究的着眼点和切入点，来看近代西康省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乃至风俗习惯等所有康藏人民之生活方式，无不受佛教的深刻影响，而藏传佛教正是康藏民族的文化核心。

正如刘文辉在治理西康的过程中所写《国人对于康藏佛教应有之认识》提出的“盖须深切了解其宗教文化之情形，在不违反其民众心理之条件下”，开展相关民族融合和地区建设的工作。

近代西康省在制定与实施民族政策的过程中，并不是强力地推行经济的建设与现代制度的变革，而是注重社会文化精神的作用。刘文辉采取较为温和的管理方式，把康藏精神与汉藏之间的情感沟通放在首位，然后逐步推行现代政治与经济设施，不仅仅重视佛教在西康拥有具体的实力这一方面，同时重视佛教的内在学理及其与西康治理和建设之间的关系。

## （二）因势利导，吸取赵尔丰经边的教训

刘文辉曾经指出西康省的文化特殊：“寺庙以外无学校，喇嘛以外无教师，所谓文化，即是佛化，其人民一切精神与物质生活悉受佛法之洗礼与熏陶，因而形成一种少欲知足的人生观，重听行而轻物欲，重未来而轻现实，生活习于固陋，鄙夷现代科学，排拒外来文化，一味守旧，不思进步。如过求更张，则易滋反感，赵尔丰之失败，多由于此，此西康文化之特殊情形。我们要建设新西康，这种特殊情形，不能不认识清楚。”

由于对西康文化特殊性的认识，刘文辉在主政西康的时候，十分重视西康的宗教文化与世俗社会的关系。刘文辉意识到西康地区的藏族文化是以宗教文化为主流，而宗教文化是以佛教文化为根本基础，西康地区民众的生活、政治、经济、文化，无不深

受佛教的深刻影响，那么，“西康这一民族地区要在政治上长治久安，一定要尊重藏族文化，而尊重藏族文化尤其是要尊重藏族的宗教，因此，针对这一情况，刘文辉决定对于西康地区的藏传佛教，采取‘因势利导，力谋政教协调，僧俗合作，以纳民于轨范’的策略，同时提出了所谓‘以教辅政，以政翼教’的口号，具有融合政教的意味”。

西康省建省之后，刘文辉对于西康地区的藏族、彝族的上层宗教人士十分重视，并且更进一步加强联系。尤其是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活佛、喇嘛等，均得到相应的党政职务的任命。这一举措使西康政府的政权中，有藏族和彝族宗教界人士的声音与身影。其中，他还采取具体的措施，扩大宗教对社会的影响，如“刘文辉将西康康属划分为四个佛教的‘宣化区’，各自遴选了康南、康北二路有影响的宗教领袖人物为‘宣化师’‘辅教师’。除了理塘二世香根活佛之外，刘文辉还任命了多位宣化师、辅教师”。

刘文辉在多次的演讲中强调宗教的重要性，“鉴于宗教对藏族各个阶级的人具有决定的影响，搞好了宗教关系，同时也就是搞好了同藏族的政治关系。因此，我把工作重点放在这方面”。因此，他的孙子刘世定在回忆录《寻常往事——回忆祖父刘文辉》中写道：“祖父在牢控军权、密切注意军事动态的同时，‘尊重康人的文化与宗教’，和藏族认识特别是高僧大德多有交往，并采取了一系列力求搞好汉藏关系和宗教关系的措施。如，召开僧侣大会，以团结各教派的高僧大德；成立西康佛教整理委员会，以处理各教派间、寺庙间、僧侣间的纠纷；拨款修建寺庙，广发布施；对在拉萨学佛的汉僧和来康定学佛的各族人士给予经济上的照顾；通过西藏的高僧大德的关系，同拉萨政教上中层人物建立广泛联系；几度派人到西藏三大寺供养，派人到拉萨学佛。他个人也时穿喇嘛服，入寺听讲经、念经拜佛。”

## 五、西康藏羌彝文化历史资源开发的现实意义

西康所在的区域，自然风景秀丽，是旅游开发的富矿区。同时多民族文化交融、历史文化传说丰富，为该地区的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资源保障。

多民族杂居状况使本地区内宗教信仰也表现出多元共生的繁荣景象，包括藏传佛教各教派、康区苯教、汉地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和彝族的毕摩信仰、纳西族的东巴教等。

康巴文化具有十分鲜明的独特性，“形成了诸如以德格为中心的康文化圈，以川西北草地为中心的游牧文化圈，以大小金川为中心的嘉绒文化圈，以贡嘎山麓为中心的木雅文化圈，以大渡河中下游河谷为中心的‘西番’文化圈等各具地域特色的亚文化圈”。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文化是其根本的灵魂所在，是文创产业的内生力和源泉活力所在。以甘孜州为例，就存在诸多的历史文化名胜遗迹。如流传“康定情歌”的跑马山，清代名将岳钟琪驻扎的大营营盘，在康定的闹市区，还树立了岳钟琪的戎装雕塑。其他还有孔明箭、郭达将军像、格萨尔王、周仓亭、八角亭、公主桥等。

在对西康藏羌彝历史文化开发的过程中，既要侧重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强相关历史文化景区的建设，也要加强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与创意转化。“文化资源的地域表现形式包括各种不同的层面，‘硬件’是指已建成的遗产、可见的连接部分、基础设施、旅游景观的各种有形方面等物理部分。硬件想转变成为旅游产品或旅游体验需要一种灵活和战略性的营销措施，使之成为旅游者头脑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吸引大量的旅游者。”

对历史故事的挖掘与转化，在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中就是“软件建设”。对于文化旅游产业来说，旅游固然是关键载体，然